

分 类 号_____

密 级 _____

U D C _____

编 号 _____10486

武汉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不生孩子是完整的女人吗？

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研究
——以豆瓣恐婚恐育小组为例

研 究 生 姓 名：岳瑾雯

学 号：2018201030051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徐开彬 教授

学 科、专 业 名 称：传播学

研 究 方 向：网络传播

二〇二一年五月

Is a woman complete without having children?
A study on the gender identity of voluntary
childless women
—Taking the Douban Group of “Fearing
Marriage and Fearing Children” as an Example

By

Yue Jinwen

May 2021

目 录

错误1. 目录在摘要之前

来源: 武汉大学
学位论文印制规范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问题.....	2
1.2 研究意义与核心概念.....	2
1.2.1 研究意义.....	2
1.2.2 核心概念.....	3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4
1.3.1 研究方法.....	4
1.3.2 研究框架.....	6
2 文献综述.....	8
2.1 自愿无子女的研究.....	8
2.1.1 理解自愿无子女:作为个体的选择.....	8
2.1.2 自愿无子女的污名与抵抗.....	8
2.1.3 自愿无子女与母性的矛盾.....	9
2.2 母性研究.....	9
2.2.1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理解母性.....	9
2.2.2 母性与女性气质的关系.....	10
2.3 女性气质和性别认同研究.....	11
2.3.1 霸权的与替代性的女性气质.....	11
2.3.2 性别操纵理论.....	11
2.4 文献评述与本研究创新点.....	12
3 自愿无子女女性的女性认同策略.....	13
3.1 自愿无子女的推力—卑贱的母性.....	13
3.1.1 病态的母亲.....	13
3.1.2 顺服的妻子.....	16
3.2 自愿无子女的拉力—优越的女性.....	18
3.2.1 叛逆的女人.....	19
3.2.2 永远的少女.....	20
3.2.3 强大的母亲.....	21
4 对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的批判.....	24
4.1 规范的母性话语:强化的呵护.....	24
4.2 母亲恐惧症的后果.....	25
4.3 “超级妈妈”的“选择”.....	26

4.4 为“美丽”赋权	27
4.5 回应批判:为母性赋权	28
4.5.1 从职责(motherhood)到实践(mothering)	28
4.5.2 走出家庭的母亲	29
5 讨论与总结	30
5.1 研究贡献	30
5.1.1 理论贡献	30
5.1.2 实践贡献	31
5.2 研究不足	32
5.3 结论	33
参考文献	34

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235个帖子进行批判性主题分析研究了女性如何将自愿无子女的选择纳入到性别认同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之中。一方面,女性能够将母性与负面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并通过挑战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拒绝将其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另一方面,女性能够融合霸权的男性气质、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发展出全新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本研究将性别操纵理论应用了中国的性别环境中,并丰富了对自愿无子女现象的研究。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并没有跳出父权制下母性的主导话语,而是将其病态化以逃避母性的规范;通过嘲笑已育女性实施的性别操纵鼓励女性责备女性,加剧了女性主义者的母亲恐惧症;后女性主义的“选择”修辞掩盖了“单身生育”理想背后不同阶层女性的经济差异和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小组成员对“少女感”的追求支持了后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再度性化。

关键词: 自愿无子女; 母性研究; 女性主义; 后女性主义; 恐育; 网络传播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women incorporate the choice of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to diverse developmental pathways of gender identity through a critical thematic analysis of 235 posts in the online Douban group of “Fearing Marriage and Fearing Children”. Female users are able to associate maternity with negative femininity and reject it as central to their female gender identity by challenging motherhood as institution under patriarchy; Besides, they are able to blend hegemonic masculinity, heterosexual traits emphasizing sexual attraction, and maternity that demonstrates love and care to develop new alternative femininities. This study applies gender maneuvering theory to the Chinese gender context and enriches the study of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stead of stepping outsid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patriarchal maternity, voluntarily childless women pathologize it to escape maternal norms; the strategy of gender maneuvering through laughing at mothers encourages female users to blame other women and exacerbates feminists’ matrophobia; post-feminism rhetoric of “choice” obscures the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women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in parenting behind the ideal of “single motherhood”; the pursuit of “girliness” supports the post-feminism re-sexual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Key words: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motherhood research; feminism; post-feminism; fear of childbirth; online communication.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1.1 研究背景

根据我国公安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户籍登记 1003.5 万人，对比 2019 年的数据少了 14.9%，人口出生率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短暂冲高后已持续四年下降。其中，适龄女性生育意愿降低是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张竞月，2020）。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自愿选择不要孩子的女性持续增多，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正在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制度造成冲击（Lynch et al., 2018）。

在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女性被认为是天生的母亲，生育对女性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强有力的观点奠定了女性作为母亲的生物话语建构，同时拒绝了将不生孩子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的可能性（艾华，2008）。因此，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被认为是违背了女性的天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要求，有可能被其他社会成员贴上“自私”、“不正常”的污名化标签（Gillespie, 2000）。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近二十年来，人们对自愿无子女的理解已经由“离经叛道的选择”转向了“女性主义的议题”（Lynch et al., 2018）。近年来，随着我国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恐育”的情绪在网络媒体上逐渐兴起。尽管年轻的女孩们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愿无子女的意愿可能会遭到家庭的反对，但在网络空间中，她们可以找到越来越多有同样想法的姐妹，共同表达对分娩之痛的恐惧，对抚育之艰的想象，以及对生育阻碍职业发展的担忧（高荣，2020）。

Clinton 和 Hintz（2020）的研究指出，网络空间中的互动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提供了抵抗母性的道德压力的空间，她们可以在网络社区中互相鼓励，增强群体意识，并提出对抗污名化标签的多种策略。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中，类似的组织同样显示出活力，豆瓣恐婚恐育小组自 2020 年 5 月建组以来，已有超过两万五千名组员。这是一个只欢迎女性的网络小组，相比有固定伴侣或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社区成员主要倡导女性保持单身且不生育，这意味着她们有更少的机会反悔去生孩子。这一激进的网络女性社区可以作为研究自愿无子女女性群体的典型个案。

1.1.2 研究问题

也许一直以来都有女性自愿选择不要孩子。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女性的选择不为人知的。“老姑娘”的身份可以为那些逃避母性的女性提供合法身份，但这些角色的意义是“损失”和“遗憾”(Weigle, 1982)。它们未能挑战，甚至是支持并融合了霸权的女性气质和母性的文化话语。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孩子的女性是不完整的”这一论调依然受到广泛认可，就在 2020 年，多家媒体报道了没有孩子的舞蹈家杨丽萍在网络中遭受的非议。尽管规范的文化话语将母性假定为女性的终极满足和女性身份的基石，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逃避母性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她们能够拒绝母性及其与女性气质的霸权观念的联系。在本研究中，我将聚焦于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女性组员在网络社区中发表的文本，考虑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这些女性如何描述她们自愿无子女的生活方式和她们所作的选择？其次，这些描述对理解母性与女性性别认同的关系有何种启示？换句话说，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们如何在规范的母性话语之外重新理解她们的女性身份？最后，母性，女性气质，与女性主体性之间依然存在复杂的关系张力。尽管自愿无子女可以视作与主流话语的对抗，然而，这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反而有可能存在重叠和相互作用。正如 Gill 和 Scharf (2013) 指出，注重个人主义、选择和赋权的后女权主义依然有可能重新再现母性与女性气质的霸权观念，因此，我将从批判的视角进一步考察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在建构性别认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隐蔽的话语权力的运作，它可能是对女性主义发展的阻碍，也不利于建构符合女性主体性的母性观念。

1.2 研究意义与核心概念

1.2.1 研究意义

尽管成为母亲长期以来是女性成熟身份的基础，然而，随着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数量逐渐增多，很难再将这一群体视为病态的和污名化的。如果主流话语依旧将“母亲”设定为一个成熟完整的女人所必须具备的角色，那么无论是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还是自愿无子女的女性，都无法为我国的社会发展贡献出全部的潜力。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发展一个关于女性权益的更广泛的观点，将自愿无子女的选择纳入到女性身份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之中。

其次，了解女性为什么做出不要孩子的决定有可能从反向视角为当前我国的低生

育率开出一剂良方。自愿无子女的选择同样可以传递出有关生育的诉求，它有可能使得关于分娩疼痛，家庭分工，抚育焦虑的议题进入公众视野，起到反映民情的现实作用。在此基础上，倘若社会各部门机构能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女性生育风险，改善女性生育条件，那么，生育并抚养孩子将会对女性更有吸引力。

最后，女性做出不要孩子的决定通常与成为母亲的想象和期待有关（Maher and Saugeres, 2007）。假若女性认为做一个母亲是艰难和痛苦的，她们就会倾向于逃避母性。因此，了解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如何理解母亲的身份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目前主流的母性话语中存在的问题。它是否将抚育的压力集中在女性身上，让女性在“无私”和“爱”的名义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劳动？修正社会对母亲的高要求和高期待同样有可能对生育率起到促进作用。

1.2.2 核心概念

1.2.2.1 自愿无子女

自愿无子女（voluntarily childless）是与非自愿无子女（involuntarily childless）相对的概念，后者指因为不孕不育而没有孩子，前者则指自愿选择不生育孩子，学术界最早在 70 年代对这两个名词做出了区分（Moore, 2014）。到了 90 年代，生育自由（childfree）作为自愿无子女的同义词出现，并被认为是剔除了“无子女”所包含的负面含义。考虑到中国社会中强大的繁殖主义传统，我认为“自愿无子女”的定义更易于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自愿无子女”的定义依据是女性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只要女性主动选择不生孩子，无论是这一决定是否还有反悔的余地，都不影响她们是自愿无子女女性。领养孩子，成为继母，以及女同性恋的生育决定很少在豆瓣恐婚恐育小组被提及，本研究暂不考虑这些情况。

1.2.2.2 母性

母性（motherhood）包含了与怀孕，分娩，抚育孩子有关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以及从事实践的个体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私，关爱，与孩子的亲密关系等情感特质（Peterson and Engwall, 2013）。O'Reilly（2016）总结了父权制下母性的规范话语的主要内容，包括：母性是女性身份的基本和基础；母亲的工作被限制在家庭内部。母亲是一个人的工作和责任；所有女性都自然地知道怎么做母亲；母亲的角色被限制在核心家庭中，她是丈夫的妻子，并承担养育者的角色；母性是无私的，以孩子为中心，需要通过密集的情感劳动培养与孩子的关系；母性具有生物学意义，只有生母才能被定位为真正的母亲。

1.2.2.3 母亲恐惧症

在父权制的母性的影响下，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儿可能会拒绝成为母亲。因为她不愿意像她的母亲那样生活，也不愿意与一个受压迫的、工作被如此贬低的人为伍。Rich 指出（1995），成千上万的女儿认为她们的母亲教会了她一种妥协和自我憎恨，她们正努力摆脱这种自我憎恨。Rich 将这种母女之间的距离感称为“母亲恐惧症 (matrophobia)”，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女性的自我分裂。母亲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受害者、不自由的女人、殉道者。

1.2.2.4 女性气质

本研究采取 Jaji（2015）的定义，将女性气质（femininity）概念化为一组传达了女性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表现所期望的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观。女性气质具有多样性，目前占据社会主流话语的霸权的（hegemonic）女性气质以异性恋为核心，强调女性的脆弱，对婚姻的接受，母性，以及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吸引力（Connell, 1987）。

1.2.2.5 后女性主义

后女性主义（post feminism）是女性主义在当代的一种反弹，其中女性主义既被部分地肯定，也被部分地否定。Gill 和 Scharff（2013）总结了后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女性气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身体属性；一些女性化的表现方式从物化向主体化转变；强调自我监督和纪律；注重个人主义、选择和赋权；自然性别差异观念的复兴；女性身体的显著再性别化；强调消费主义和差异的商品化。

括弧中对名词的英文指正不统一，有大写起头，有小写起头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1.3.1 研究方法

1.3.1.1 选择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豆瓣恐婚恐育小组。豆瓣小组是互联网平台“豆瓣”的一项公共论坛服务。用户可加入自己感兴趣的小组，在小组内创建包含文字、图片、或链接的帖子。帖子的评论可以被其他成员点赞或评论。管理员有权限设立审核入组制度，将帖子加精或删除。豆瓣恐婚恐育小组创立于 2020 年 5 月，至今已有超过 2 万 5 千名组员和未知数量的读者。该小组有较严格的准入机制，申请人需要回答管理员设置的问题，经审核后放可入组发言。该小组排斥男性进入，成员在申请入组时需要发誓自己不是男人，管理员也会审核申请入组的用户的豆瓣主页，确保没有表现男性身份

的动态。一旦发现有组员的言论表现出男性身份时，其他成员可向管理员举报，将该组员踢出小组。恐婚恐育小组鼓励成员畅聊恐婚恐育的理由，分享恐婚恐育的故事，“4b”（不恋爱、不发生性关系、不婚、不生孩子）是小组成员倡导的方向。该小组组规禁止无意愿分手或离婚的女性咨询感情问题，禁止为男性发声，禁止宣传形婚和代孕。根据恐婚恐育小组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21-25岁的小组成员占到52%，26-30岁占21%，16-20岁占19%，31-35岁占3%。

我选择豆瓣恐婚恐育小组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选择自愿无子女的群体是多样性的，男性、女性、已婚、未婚等标准将这一大范围的群体又细分为多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之间的观念可能有所差异。例如，Gillespie（2003）就曾指出，已婚或有稳定伴侣的自愿无子女女性重视伴侣对不生孩子的意见，而这一点却完全不在单身的无子女女性的考虑范围之内。考虑到恐婚恐育小组的倡导方向和严格的准入机制，我认为以该小组为研究对象可以让本研究更好地聚焦于单身的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过程。第二，尽管其他网络平台也汇集了一批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但相比碎片化的言论，女性在恐婚恐育小组中的互动都汇集在一个个帖子中，公共论坛的讨论形式方便了研究者以主题的方式收集研究数据。

1.3.1.2 数据收集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个完全的观察者的姿态，关注而不参与小组内部的讨论。在豆瓣恐婚恐育小组中，用户知道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他们的帖子。他们也可以使用匿名昵称，并选择他们想要分享的信息。正如 Tripathy 所言（2013），如果在线社区的信息是免费供公众消费的，这就意味着允许进一步使用和分析。因此，本研究虽然免除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和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但依然符合研究伦理。

我将数据收集的范围限定2020年9月到2021年1月在恐婚恐育小组中发布的帖子。在这段时间内，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迅速增加，成员诉求由混乱逐渐变得明晰，不同帖子之间相互呼应，帖子内的讨论数量较多，一些优质的讨论被管理员设置为精华帖，这些互动非常适合进行自愿无子女的研究。我以“生育”、“孩子”、“子宫”为关键词使用小组内部的搜索功能查询了包含关键词的讨论。然后，我简要浏览了搜索到的帖子的内容，挑选出那些讨论“恐育”而不是恐婚“的帖子，以确保讨论与自愿无子女相关。紧接着，我进一步缩小了帖子的筛选标准，回复评论少于10个，通篇只有辱骂性语言发泄情绪的帖子被排出。最终，我将符合标准的帖子的标题，内容，评论等整理为word文档，结果产生了235篇帖子进行初步的分析。

1.3.1.3 数据分析

我使用 Lawless 和 Chen 的(2019)两阶段的批判性的定性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批判

2019年在作者处

性主题分析(critical thematic analysis)可以梳理出经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霸权结构、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作为一种不拘泥于任何已有的理论框架的定性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Braun 和 Clarke (2006)提出了规范的主题分析的六步骤指南, 然而, 这一方法在将日常话语与嵌套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联系起来方面是有限的。Lawless 和 Chen 的方法扩展了主题分析标准, 他们鼓励批判性地阅读研究数据, 询问编码为什么以及如何再现和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

批判性主题分析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研究者需要密切关注质性数据中揭示的主题模式。为了便于进行主题编码, 我将恐婚恐育小组的数据输入了第 12 版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中。在完成了初始编码后, 我尝试在代码中查找可能出现的主题, 发现了小组成员对生育的一些关键看法, 如“束缚”、“吸血”、“洗脑”等。在此基础上, 我尝试提炼并定义相关的主题, 如“母性的病态化”, “母亲是父权社会的生育工具”等。这些主题的浮现有助于理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如何做出自愿无子女的决定。接着, 在第二阶段, 研究者需要将封闭编码中将主题与更大的社会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我开始思考数据中出现的关于“母性”和“女性”的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具体而言, 除了考虑这些话语揭示了什么之外, 我还会考虑其中可能隐藏或缺失了什么。例如, 当恐婚恐育组的成员强调不生孩子“减龄”、“少女”时, 她们利用女性气质和母性之间的张力为自己创造了对抗母性的空间, 但这些反复出现的理由也可能折射出霸权的女性气质要求女性必须具备异性恋的性吸引力以维持性别认同。将主题分析与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从事批判性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1.3.2 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具体思路如下: 在研究准备阶段, 我首先通过发现问题找到有趣的研究选题, 接着深入了解研究背景, 确定了对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研究是有社会价值的。然后, 我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到一些关键的学术概念, 包括“自愿无子女”、“母性”、“女性气质”等。接着, 我深入查询并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 对自愿无子女的研究、母性研究、女性气质研究进行了梳理, 发现我国的自愿无子女研究还非常缺乏, 此外也缺乏针对自愿无子女和女性气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 我尝试细化研究问题, 决定研究在一个成为母亲与女性的身份如此得密不可分的环境中, 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是如何确立她们的性别认同的。然后, 我广泛地阅读了恐婚恐育小组的帖子收集数据, 并使用批判性的主题分析的方法和 Nvivo 质化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在研究分析阶段, 我将把女性的性别认同过程分为两步。首先, 自愿无子女的女

性描述了远离母性的合理性，她们可以将母性病态化，并指出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对女性造成了压迫。接着，她们可以通过描述不生育的吸引力发展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最终，融合了霸权的男性气质，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的女性气质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建构性别认同提供了新路径。完成了主题分析之后，我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考察编码为什么以及如何再现和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我发现，父权制的母性话语、霸权的女性气质依旧影响着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她们的讨论呈现出后女性主义的倾向，掩盖了女性主义所能引发的变革。

在研究讨论阶段，我尝试使用“为母性赋权”概念破除女性的“恐育”思想，这需要全社会贡献“母性的思维”减轻母性的压力，并支持母亲走出家庭，在多个领域贡献价值，以提升母亲身份的吸引力。本研究丰富了与自愿无子女、母性以及女性气质相关的研究，为改善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提出了有效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自愿无子女的研究

2.1.1 理解自愿无子女：作为个体的选择

关于自愿无子女的研究与当代家庭研究中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论题产生了共鸣（Brannen, 2005）。当调查自愿无子女的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时，“自由”（freedom）是参与者们共同提到的主题，包括：更多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改善财务状况；减少责任；尝试新的经历；有更多的机会结交朋友（Abma and Martinez, 2006; Dykstra and Hagestad, 2007; Tanturri and Mencarini, 2008）。与此同时，生育及抚养孩子带来的压力也在将越来越多的人推离这一传统悠久的家庭实践。为人父母不再是生活中不证自明的一部分，而是在仔细考虑了社会中与养育子女相关的职业、财务和生存风险之后需要做出的选择（Maher and Saugeres, 2007; Mcquillan et al., 2008）。有人甚至会采取更激进的绝育措施，杜绝生育对他们的个人发展带来的威胁（Moore, 2020）。正如贝克夫妇指出，越来越多的个体化意味着生孩子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最高目标和人生成就，而是成为个体有意识地计划、计算和恐惧的对象（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

2.1.2 自愿无子女的污名与抵抗

尽管选择不要孩子的人数在增加，但社会中强大的繁殖主义（Pronatalism）传统依然给这一群体贴上了负面的标签。Morison 和 Macleod（2015）总结了繁殖主义的三个关键假设：首先，生儿育女被认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是人类的本能和生物学决定的。其次，生育被认为是异性恋成年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也是正常性别发展的重要标志。最后，养育子女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满足，是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自愿放弃生育被理解到加速个人主义和家庭破裂，破坏个人、家庭和社会福利，该群体的成员则会收到自私、不负责任、不成熟、过于职业导向的污名（Park, 2005）。然而，自愿无子女的人能够采取多种方式保持积极的自我认同以应对偏见和歧视，三种常见的应对方法包括避免、最小化以及挑战污名（Shapiro, 2014）。自愿无子女的人能够重新配置自己与规范认同的差异，颠倒为人父母的正面定位和无子女的负面定位（Taylor, 2003），同时谴责那些

谴责他们的人，那些人干涉了人们不要孩子的自由（Morison et al., 2016）。

2.1.3 自愿无子女与母性的矛盾

尽管自愿无子女的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但性别会带来不同的影响。Chen（2006）将其概括为“自愿的父性（voluntary fatherhood）”和“义务的母性（Compulsory Motherhood）”的差异。自愿无子女的男性可以坦然承认自私的标签，并把自己塑造成比其他人更能摆脱社会约束的人，这暗示了他们优越的地位。关于控制、自主、个人责任和超越的无子女修辞维持了霸权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Terry and Braun, 2012）。然而，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则通过指出自己在公共领域的贡献反对自私的指责（Hayden and O'Brien, 2010）。她们还会强调女性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需要比男性做出更多的牺牲，正是更高的风险阻碍了她们拥有孩子（Peterson, 2015）。这些边缘的对抗策略显示出以母性为中心的女性身份的主导结构依旧制约着自愿无子女的女性。

2.2 母性研究

2.2.1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理解母性

Rich 的《女人所生：作为体验和成规的母性》(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是关于母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奠基性书籍。Rich 在书中区分了母性的两种含义（1995）：作为体验的母性是任何女性与其生育能力和子女之间的潜在关系；作为制度的母性旨在确保母亲的潜力及所有女性处在男性的控制之下。Rich 认为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母性”一词实际上指的是父权制（patriarchy）下作为制度的母性，它是由男性定义和控制的，对女性具有压迫性。

虽然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做一个“好妈妈”对中国女性来说依旧是不小挑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投入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工作中，她们的孩子可以由（外）祖父母或保姆代为照顾，但养育孩子仍然被视为妇女的“自然”角色，中国的文化观念鼓励女性享受为人母的乐趣（Evans, 2005; Adams, 2016）。从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展开以及对儿童“素质”教育的提倡，“好妈妈”被定义为能够为孩子牺牲自己的利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一个优质的孩子的母亲（Greenhalgh and Winckler, 2005）。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竞争的加剧，“拼妈”现象盛行。金一虹和杨笛（2015）认为，一个当代的好妈妈不仅需要为孩子的生活负责，

还需要全线介入孩子的学习教育，让孩子在各阶段升学中保持优势。与此同时，“丧偶式的育儿”的流行话语指向了育儿分工中的父职缺失。尽管中国女性正在走出家庭，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并没有显著改变，这加剧了女性的育儿焦虑，逼迫她们努力化身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超级母亲”（郭戈，2019）。作为对高难度的生育想象的回应，“恐育”情绪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逐渐兴起，女性担心生育带来的身心损害以及对职场晋升造成的阻碍；同时，她们也担心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而孩子的父亲却不愿分担育儿责任（高荣，2020）。中国的女性正在患上母亲恐惧症。然而，正如 O'Brien 指出（2007），母亲恐惧症可能存在对女性不利的后果，它鼓励女性责备女性，而不是父权制。自愿无子女的女性需要在母亲的身份之外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性别认同方式。为此，我们需要回到母性与女性气质的关系上来。

2.2.2 母性与女性气质的关系

母性，以及与生理和文化母性相关的实践和象征，在历史上和传统上都被理解为典型的、理想女性的基本要素(Letherby, 1999)。Gillespie(2003)将母性描述为女性的终极满足和霸权女性气质的一部分。养育孩子被视为女性的职责，母亲被视为女性本身，母性构成了正常、健康的女性身份、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核心，并最终决定了“女人”一词的含义（Gillespie, 2000）。成为母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仪式，意味女性从未成熟的少女阶段成为一个完全成熟、完全无私的女人。与此对应，选择不做母亲的女性会被认为不那么女人（Rich et al., 2011）。在中国，女性作为母亲的生物话语建构限制了将不生孩子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的可能性。艾华指出（2008），没有孩子代表着对“正常”的女性身份的扭曲，这违背了女人的天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要求。

另一方面，母性与霸权的女性气质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张力。母性有时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failed）女性气质。母亲缺乏紧致的、光滑的、作为异性恋的欲望场所的身体，这与女性渴望保持年轻、亲密和性吸引力的理想之间存在矛盾（Boulton and Malacrida, 2012）。与此同时，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成为合法的母亲之前必须先做一个男人的妻子，妻子的身份可能限制了母性的潜力（Johnson, 1988）。母性与女性气质的复杂关系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建立与母性分离的性别认同提供了有潜力的协商空间，她们也需要克服霸权的女性气质所要求的社会期待。了解关于女性气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

间隔有问题，这里应是中文括号

2.3 女性气质和性别认同研究

2.3.1 霸权的与替代性的女性气质

Schippers (2007) 把霸权的女性气质视作与霸权的男性气质的对应物，它凌驾于其他的女性气质之上。霸权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互补关系共同维护了当前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在 Schippers 的模型中，其他形式的女性气质尽管被边缘化，但并不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它们具有男性气质的内涵，因此，不被认为是劣等的。相反，Schippers 称它们为“被遗弃的 (pariah)”女性气质，这些女性气质模糊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在父权制社会中，一个表现出放荡不羁、攻击性和权威特质的女性会威胁到男性的主导地位的稳定，她们可能会被冠以“坏女孩”、“男人婆”等称呼。这些具有负面含义的称呼不仅反映出霸权的男性气质对女性的遏制，也反映了霸权的女性气质与其他女性气质之间“主流-边缘”的关系。

有意对抗和拒绝霸权关系的做法也可能出现。Schippers (2007) 将其称为“替代性的 (alternative)”女性气质。在这种女性气质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霸权关系可以被有意地替换为没有阐明女性和男性之间支配和从属的互补关系。替代性的女性气质之所以具有抵抗性是因为它们破坏了男性主导的关系，而被遗弃的女性气质则被污名化，对霸权性的性别关系威胁较小。替代性的女性气质能够以“叛逆的 (rebellious)”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以蔑视社会中对女性的文化期望为前提，表现出对父权制的公然对抗。叛逆的女性可以通过个人经济和社会抱负展现自身价值，也可以运用嵌入在规范女性气质中的女性特质 (Jaji, 2015)。正如 Carlson 指出 (2011)，女性越来越多的表现出男性气质的风格，并将其作为自身主体性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协商与融合的产物。

2.3.2 性别操纵理论

Schippers (2000) 调查了女性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打破性别规则，并创造替代性的性别关系后，把这些行动策略称为“性别操纵 (gender maneuvering)”。性别操纵是一种集体努力，积极协商性别和意义和规则，以重新定义在特定语境的规范结构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霸权关系。这些策略改变了人们熟悉的性别含义，违反了互动规则，并改变了立场，从而使性别关系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遭到破坏和转变。在有效的情况下，它们挑战局域性的性别关系，产生替代性的性别关系。

在实行性别操纵的过程中，女性需要考虑如何在多种女性气质之间进行协商。特定的女性特质中会让一部分女性受益，而另一些女性则名誉受损。不同群体的女性之间存在的竞争可能意味着父权体系下女性气质之间的谈判（Finley，2010）。女性使用某些女性特质的标准来评价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行动，并将与自己不同的女性他者化，给她们贴上污名的标签，这可能在女性之间造成分裂（Lundstrom 2006）。性别操纵理论不仅关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协商关系，同时也关注女性气质之间的内在关系。

人名与日期间没有“”

2.4 文献评述与本研究创新点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的关于自愿无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们选择不要孩子的理由，他们是如何应对自愿无子女的污名，以及女性做出违背母性的选择需要面对的压力。考虑到父权制的母性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并要求女性以无私和爱作为行动的准则，在个体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患上了母性恐惧症。然而，母性与霸权的女性气质之间的紧密联系给女性逃避母亲的义务造成困难。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女性可以通过性别操纵的策略调用替代性的女性气质维持性别认同，但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尚不得而知；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对父权制的抵抗有可能再现了父权制下的性别压迫和母性的规范话语，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尚不清晰。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Schippers 的性别操纵为理论框架，考察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如何运用多种策略建构替代性的性别认同，并探索自愿无子女与霸权的女性气质和母性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复杂的重叠与互相作用。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尽管自愿无子女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都在逐步增加，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中国的自愿无子女群体进行过详细考察。本研究将选取豆瓣恐婚恐育小组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网络社区的成员如何描述她们做出的不要孩子的选择；第二，尽管女性主义研究者对父权制下的母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但很少有人关注如何开发在母性之外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本研究将以自愿无子女的女性群体为研究透镜，深入分析母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Schippers 开发的性别操纵理论常用于分析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女性，如女运动员，女摇滚歌手等群体，但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是如何使用性别操纵策略的尚不得而知，本研究拟将这一理论的应用扩展到中国的自愿无子女女性群体中，考察性别操纵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

3 自愿无子女女性的女性认同策略

正如 Peterson (2015) 指出, 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使用的话语通常涉及两个部分: 其一是远离母性的合理性, 其二是有关不生育的吸引力。本研究发现, 该群体采用的性别认同策略与上述两种话语互相照应。一方面, 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能够通过将母性病态化, 拒绝将其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 同时通过挑战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 合理化不生育的决定; 另一方面, 融合了霸权的男性气质, 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 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建构性别认同提供了新路径。以下将分别对上述两种性别认同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3.1 自愿无子女的推力—卑贱的母性

对霸权的性别气质进行嘲弄是实施性别操纵的重要策略 (Schippers, 2002)。人们常采取夸张、戏仿等手段将遵守性别气质的个体描述为荒谬和可笑的, 以实现对其既有性别规范的嘲讽和抵抗 (Finley, 2010)。在本研究中, 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通过将母性描述为卑贱的, 把它从女性的性别认同中排除出去。一方面, 她们把母性描述为病态的, 与消极的女性气质, 包括非理性、被动、软弱等特质联系起来, 为自身远离母性提供合法的空间; 另一方面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认为父权制婚姻中母亲作为顺服的妻子的身份限制了母性的潜力, 并造成女性独立性的损失, 这挑战了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

3.1.1 病态的母亲

3.1.1.1 以苦为乐的受虐狂

牺牲的必要性一直是母性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鼓励女性享受在怀孕, 分娩以及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从事的“爱”的劳动 (labor of love), 并令那些减少并避免牺牲的母亲感到羞愧 (Choi et al., 2005)。然而, 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调用新的解释框架, 将无私的母亲重新描述为一个以苦为乐的受虐狂加以抵制。

例如, 在一个帖子中, 楼主分享了微博上一位母亲的自述, 这位母亲在生育后身材变胖, 肚子上长出妊娠纹, 还有漏尿和耻骨痛的问题, 但她表示为了孩子一切病痛都是值得的。楼主嘲笑这位母亲, “身体烂成这样还美滋滋的, 是个合格的机器”。其他评论支持了楼主对母亲的病态化, “她自己都没把自己当个人……到底是智商不够

用还是咋回事”，“我忍不住怀疑这些女人的底线是不是只是活着”，“按她的口吻，漏尿小 case，甚至还有点自豪？？ ” Boulton 和 Malacrida（2012）指出，母性的霸权观念要求女性将承受痛苦作为迎接母性到来的仪式。然而，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却质疑这种规范中鼓励女性承担生育损失的合理性，并将内化了自我牺牲要求的母亲描述为愚蠢的，非理性的女人。

在另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自己听到的一位母亲的经历。这位母亲在生完一胎后疼得无法上厕所，然而，在听过丈夫“这么点儿疼都受不了，以后怎么要二胎”的激励后，她忍受住了疼痛，后来也生了二胎。楼主直接称这位母亲为“受虐狂魔”，评论进一步将母亲的行为与“斯德哥尔摩”病人的症状类比，指出母亲行为的荒谬之处。“动物知道被伤害了会反击，会逃离，有些婚女却逆来顺受，确实是有病，而且需要去看病那种”，“她们觉得自己为了爱付出，觉得自己伟大无私奉献，从里面过得精神满足，受虐让她们感到满足，疼痛给她们快感”。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认为追求并迷恋自我牺牲的母亲像是患上了心理疾病，她们的行为违背了人类应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类似的描述拒绝了将无私的母亲视为伟大的主流话语，相反，她们将母亲视为不正常的，非人的。

3.1.1.2 为子而活的吸毒者

当代的母性神话中对母亲的另一个要求是对孩子密集的情感投入。Nelson 批判性地将社会对母亲的这一理想化的期待称为“过度养育（parenting out of control）”，它要求母亲保持对孩子的持续关注、风险管理、和高水平的情感亲密（2010）。受到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母性观念的影响，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形象地将母亲的精神状态与吸毒者进行了类比，她的一颦一笑都被孩子所牵制，她是为了她的孩子而活，这样的描述进一步将规范的母性理想病态化。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指出了生育对女性来说最可怕的影响，“这个世界上从此会存在一种‘失去他你就活不了’的东西。你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是为了他人存在的。你的生死存亡，喜怒哀乐，从此不由你自己做主”。评论中的组员进一步分享了她们了解到母亲的故事，“周围生完孩子的同事，被孩子死死捆着，上班聊孩子，下班带孩子，赚钱带孩子做家务一个不落”，“新闻里孩子走失或被拐卖的母亲，余生唯一一件事就是失魂落魄寻找孩子，行尸走肉的活着”，“小孩是母亲最脆弱的软肋，活在世上软肋越少越好，少一根是一根”。这些言论将母亲描述为情感脆弱的、依附于他人的，这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合理化自己的生育决定提供了空间，她们选择不要孩子是为了避免成为那种软弱的女人。

在另一个帖子中，楼主直接将母亲比作吸毒者，“为人母的状态更像是一种吸毒

行为的开始，一日吸毒终身戒不掉，一边自我沉醉，一边被吸干日渐憔悴。与其研究吸毒技巧，不如一开始就别吸”。评论支持并补充了这一看法，“像不像沾了某种东西？只要一看到婴儿笑脸，体内多巴胺疯狂分泌，快乐开始蔓延……一旦失去孩子，戒断反应能让人想死”，“花钱无底洞，失去健康、时间、事业，和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状态，养育和吸毒的本质根本就是一样的”，还有评论指出生育甚至比吸毒更可怕，“戒毒是可以戒的，生出来的孩子就像拉出去的屎，回不到肚子里的”。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认为母亲表现出的对孩子的过度关爱是一种病态的“上瘾”，她们为此放弃自己的生活，成为被孩子控制的客体。这样的描述颠覆了规范的母性话语中的好妈妈形象，将母亲视为被动的、失去了主体性的女人。

3.1.1.3 被洗脑的生育机器

女性身体的生育能力被理解为女性的本体论基础，并被建构为女性有别于男性的重要特征(Malson and Swann, 2003)。作为社会和文化建构产物的母性也随之被生物化，人们认为生育并抚养孩子是女人的母性本能，女人天然地具有成为母亲的驱动力（Crawley et al., 2008）。然而，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却有能够抵制成为母亲是自然而然地观点，具体来说，一方面，她们能够将女性所具有的母爱理解为自然界为了维持繁衍对女性施加的控制。另一方面，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认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成为母亲，而是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引用了一篇科普文章，其中讲述了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就会分泌相关激素培养母亲对孩子的关爱。楼主认为，“大自然设定用荷尔蒙控制了女性，自愿为后代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这样物种才能繁衍下去，这个设定就是残酷的不合理的。唯有从源头上不生育，才能对抗这个残酷的游戏”。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非常同意，我完全相信很多劝生的人说‘生了就喜欢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恐怖片”，“自然界哺乳动物大部分都是雌性自己带娃，为了让雌性‘心甘情愿’的当母亲，演化对我们大脑、激素下手的水平，我都没办法完全想象”，“我怀疑母爱只是激素而已，不是真正的爱”。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将母性描述为受到生物本能控制的、被动的女性特质。母亲只是在完成自然界交付的繁衍任务，她们的身上表现出兽性，并不具备人类应有的控制动物本能的优越能力。这些描述将母性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视为不如人的加以拒绝。

此外，将自然化的母性理解为社会的洗脑也有助于抵抗主流的繁殖主义观点。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质疑为什么社会从来没有给女性普及过生育的伤害，“我身边绝大多数女性都是以‘被欺骗’的方式进入生育的，包括我的母亲，懵懵懂懂就被推入了婚育，整个社会都非常有默契地刻意隐瞒淡化生育给女性生理与心理带来的巨

大冲击，单方面放大孕育新生命、成为母亲的美好”。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对母性的歌颂是社会有意建构出来的，有人将社会中对生育的赞美比作广告，“吹得十全十美的广告通常都是虚假的，虚假广告通常都搭配假冒伪劣”，也有人认为很多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听见别人说有小孩多好就生了，不夸你伟大怎么给你洗脑，逼你生孩子，道德绑架罢了”。这些言论将母亲视作被舆论和社会观念控制的女人，她们不独立、缺乏自主意识；相反，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则看透了伟大的母性背后的“谎言”。

总而言之，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通过集体讨论实施将母性神话中的多个核心要素病态化，她们认为无私是受虐狂的同义词，爱孩子是染上了毒瘾，而女性是天生的母亲的观念也不过是大自然和社会对女性的控制手段。这些描述最终将母性与一系列负面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母亲是非理性的、依赖他人的、被动的、脆弱的女人。因此，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能够将母性从女性的性别认同中分离出来，拒绝母性意味着不愿意与那些病态的女人为伍。

3.1.2 顺服的妻子

3.1.2.1 为丈夫生孩子的妻子

当代规范的母性话语将母亲限制在了核心家庭的范围内，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先，必须先做丈夫的妻子（Chodorow, 1995），这种关于母性的社会期待常令未婚先孕的女性遭受污名。然而 Johnson 却指出（1988），正是妻子，而不是母亲的角色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作为异性恋的妻子需要服从丈夫，这可能与表现爱与关切的母性存在冲突。父权制下，女性作为妻子与母亲角色之间的张力为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提供了对抗霸权的性别认同的空间。

重男轻女是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发生冲突的一个典例。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小红书 app 中的“接男宝”现象。怀孕的女性用户在男婴儿的照片下留言，许愿自己也能生一个儿子。楼主嘲笑了这些母亲，“中国女人根本不爱孩子，不然堕女胎几千万是谁干的？”，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认为重男轻女的母亲只是丈夫的附庸，“很多当妈的都是极端厌女而不自知，精神男人罢了”，“封建余孽啊，本质媚男，这些女人不配说是女人”，“男人分为两种，生理男人和精神男人，有多少女人恨不得当男人”。这些讨论将作为妻子的母亲排除在女性群体之外，因为她们看轻自己的女性身份。

也有讨论指出，作为妻子的母亲只是为男人传宗接代，她们本身对孩子缺乏感情。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女性不听医生劝告非要怀孕，生

下孩子后很快就去世了的新闻。楼主责备了这位母亲，“你的孩子生下来就失去母亲，没有母爱，你觉得他会感谢你舍命生下他吗？真的很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父母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唯一对自己的丈夫负了可笑的责任”。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她只是把孩子当祭品上供给男方家庭，以求安生而已，男人就更无所谓了，又不是我生，死了就重新找呗”，“怕被婆家嫌弃，宁死也要为男权社会添砖加瓦”。这些讨论描述了女性作为妻子的身份如何扭曲了作为母亲的潜力。

尽管大多数母亲并不会像上述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极端，但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认为，在一个生育必须与异性恋婚姻捆绑的父权制社会中，妻子的身份意味着女性把爱都给了她的丈夫，而孩子只是爱丈夫的副产品，她们将这一理念总结为“妻母非母”。例如，一位组员解释了她选择不生育的理由，“我怀疑当女人不能足够强大之时，是否发自真心有那么强的生育意愿呢？是否生育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为男人，为传统而生，那么这种生育行为自然只是门生意，与伟大无关”。另一位组员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也许在母系社会我会考虑生孩子，但现在，生育和男权社会掺杂太多了，生女儿是男人培养妻子，生儿子是让他们去糟蹋别的女孩，与其做男权的帮凶，不如不生”。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有意识地区分了 Rich（1995）所提到的“作为体验的母性”和“作为制度的母性”，并使用前者对抗后者，以及后者所展现出的霸权的女性气质，它要求女性首先成为顺服丈夫的妻子。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并不是简单地拒绝成为母亲，而是拒绝作为制度的母性。她们质疑母性在与霸权的女性气质结合中出现的异化，挑战了后者作为女性的理想形象的正当性。

3.1.2.2 丧失自我的家庭主妇

此外，妻子的身份还可能与母性的规范话语结合，加深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次要地位。在核心家庭的内部分工中，社会通常默认丈夫是负担家计的人（breadwinner），而妻子则是提供照顾的人（provider），这导致妻子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并成为家庭主妇（Correll et al., 2007）。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的双职工家庭已逐渐成为主流，但这种家庭分工并未得到显著改变。尤其在女性生育后，抚育孩子的主要工作依旧落在母亲身上，这可能进一步将女性推回到私人领域的家庭中。已有研究指出了生育对女性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Benard and Correll, 2010），有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升职空间将显著减少，而有孩子的男性在职场上却会变得更具有竞争力。

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会影响自愿无子女者的生育决定。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预计到男性伴侣在育儿中参与度较低是女性选择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她们不希望因为生孩子变而成家庭主妇（Peterson, 2015）。本研究中，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也反

抗不平等的育儿分工，她们通过揭示家庭主妇的不幸遭遇质疑霸权的性别规范的合理性。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自己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有了孩子后辞职的经历，惋惜她失去了职业晋升的机会。评论中进一步指出了家庭主妇丧失了独立性的后果，“自己生自己养，学业和工作机会没了，晋升通道关闭，付出全部孩子不和你姓，车房没有你份，暂住在别人屋檐下，伸手讨饭吃的日子”，“女人受这么大折磨，孩子还不能随自己姓，工作也没了，很多老公说养家，也只是给孩子出钱而已，女人随便给自己买点东西都会被嘴碎”。尽管霸权的女性气质鼓励妻子依赖她的丈夫（Connell, 1987），但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将依赖与顺服重新理解为“损失”和“遗憾”。自我奉献的家庭主妇在这种语境中成为了贬义词，她只是丈夫的附庸，无法在公共领域实现个体的价值，类似的描述挑战了关于母性和女性气质的霸权观念。

总而言之，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通过集体讨论质疑父权制婚姻中的母亲作为妻子的合理性。一方面，妻子的身份可能造成母性的扭曲，让母亲成为为丈夫生孩子的厌女者；另一方面，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可能联合起来加深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让她们退回到家庭主妇的位置，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这些描述绕过了母性作为女性的性别认同的核心，而是从边缘路径抵抗霸权的女性气质中所要求的异性恋的、对男性的依赖和顺服，以及作为制度的母性，我认为这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建立更包容的性别认同留出了空间，她们并没有彻底否定母性的价值，而是以不生育的方式对抗父权制社会对母性的压迫。

3.2 自愿无子女的拉力—优越的女性

Carlson 指出（2011），相比单一的、自我巩固的男性性别认同，女性的性别认同过程通常表现出多元化（multiplicitous）和自我增值（self-proliferating）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性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霸权的女性气质，而是通过历时性的发展将性别认同扩展到新的领域，即使这些领域是女性不被鼓励被加入的。女性的性别认同中通常包含着多重身份，从传统的母亲、妻子、女儿，逐渐扩展到女白领、女运动员、女兵等。Carlson 认为，在当代社会，能够平衡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独立女性越来越受到文化的认同。本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同样通过扩展女性气质的边界来发展替代性的女性气质。她们能够将追求与众不同和自我实现的男性气质、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共同纳入到全新的性别认同当中。

3.2.1 叛逆的女人

3.2.1.1 从“自私”到“爱自己”

Terry 和 Braun 发现 (2012) 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在解释他们所做出的生育决定时会承认社会对他们“自私”的指责，并把自己塑造为更能摆脱社会约束的人。这种强调与众不同的“叛逆”修辞具有霸权的女性气质的特质。本研究发现，恐婚恐育小组中的女性也通过强调对规范的女性性别认同的蔑视来发展替代性的女性气质。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自己应对亲戚催婚催生的经历，尽管家中的亲戚长辈指责她打算不生孩子的决定很“自私”，但楼主解释了自己的决定，“其实就是自私一点活着就好，自私不代表侵害别人利益，只要你没伤害别人，但是被人说自私，那就说明你活的很好”。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她们认为“自私”的标签并不具有负面意义。“姐妹们不要被道德绑架了，‘自私’的人最好命”，“只要我自己没有道德，就没人能道德绑架我。女性应该道德感越来越低，才能坚定的不生孩子”，“有一个帖子在很多小组都发过，穿越回去想对 18 岁的妈妈说什么，几乎每个组的回答都是让妈妈别生孩子自私的过一生”。Finley (2010) 的研究发现，“挪用 (appropriation)”是女性实施性别操纵的一种重要策略，她们能够将被遗弃的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负面标签重新解释为积极的，以发展在霸权的女性气质之外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本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表达自己叛逆的女性特质，她们积极地为自己贴上“自私”的标签。

恐婚恐育小组的女性还会进一步将“自私”的正面意义解释为“爱自己”。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自己的妈妈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故事后总结道，“很多中国女人对孩子和丈夫的爱太多，对自己的爱太少，她们被教育成这个样子，还要让女儿继续这样做。抵制生育就要从爱自己开始”。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必须坚持‘我’本位思想，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没错，聪明的女人都是爱自己的，为家庭为孩子而活才是看多了媒体和宣传的洗脑”，“没有必要爱牌坊，趁年轻把养小孩的时间拿来提升自己、赚钱、兼职，运动，难道以后会过得不好吗？”。以他人为导向是霸权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重要期待之一。之前的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通过解释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比如在职场上创造价值，来抵制“自私”的指责，这反映了以他人为中心的性别规范依旧对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有吸引力 (Hayden and O'Brien, 2010)。然而，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采取更激进的抵抗策略，她们蔑视了霸权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规训，并认为自己是比一般女性更优越的、爱自己的女人。强调自我与他人的边界并建立优越感在过去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特征 (Carlson, 2011)，而恐婚恐育小组的

成员的讨论则证明了女性越来越有可能使用男性气质的话语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重要策略。

3.2.1.2 “掌控人生”的选择

Peterson 指出 (2015), 越来越多的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将生育理解为束缚, 她们将不生育描述为一种保护和维护独立自主的身份的方式。本研究发现, 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同样为自己的选择贴上了“独立”、“掌控人生”、“自由”等标签。

例如, 在一个帖子中, 楼主作为一个已育女性, 分享了自己与男方分手后放弃孩子抚养权的经历, 她表示虽然一开始也会想念孩子, 但“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现在非常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女人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评论中表达了对楼主的支持, “姐妹, 你真的太酷了, 太酷了! 女人首先是自己, 其次才是谁的母亲, 谁的女儿, 谁的老婆”, “你很有勇气的! 摆脱了绝大部分逆来顺受的女孩子的命运, 以后一定能活的很精彩”, “女性永远只属于她自己, 是独立的人格, 不是‘孩子他妈’的单一标签”。这些言论强调了“独立”、“自主”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价值。

相似的, 在另一个帖子中, 楼主分享了自己选择自愿无子女的理由, “不生孩子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极简, 才能真正的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自由行走在世上, 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尽情体验这个世界”。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 认为自愿无子女是她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后半生没有任何牵挂”, “每一个女人都是完整独立的个体, 有资格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被孩子绊住”。这些言论强调了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作为独立、自由、理性和负责任的决策者所拥有的积极的性别认同。而这些特质在过去则被认为是男性拥有的 (Terry and Braun, 2012)。这与 Beck 夫妇的发现一致, 社会中日渐增长的个体化趋势正在让女性的正常生活故事更接近男性 ((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能够将霸权的男性气质中包含的“自主”、“控制”等特征纳入到女性的性别认同中, 为自己建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

引用在括号内需采用

3.2.2 永远的少女

尽管长期以来, 成为母亲被认为是女性成熟的标志 (Choi et al., 2005), 然而, 正如 Boulton 和 Malacrida 所指出的 (2012), 无性的、无私的母性理想与保持年轻、亲密和性吸引力的女性气质之间存在矛盾, 这为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保持女性身份并抵制母性提供了空间。具体来说, 她们认为不生孩子的女性可以长久地保持一种“少女感”。“少女感”重新主张了霸权的女性气质所要求的性吸引力, 但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推翻了其背后的父权制联想, 将保持年轻美丽视作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有意识地拥抱

的资源。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一位四十岁的单身组员分享了不生孩子的好处，她尤其强调了自己外貌上较同龄已育女性的优势，“目前为止，我跟很多二孩同龄人站在一起，都不像一个年龄段，哪怕不少已婚已育的九零后，状态也不如我，也得羡慕我脸上没有生育过后的黄褐斑，而且皮肤白嫩，不长皱纹。可见不生孩子是女人的不老药”。评论中提供了更多她们身边的例子，“我认识的所有 35+ 的未婚未育的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5 岁以上，最夸张的有那种三十好几的看着像十八九岁，超级嫩”，“不婚不育真的让人年轻，我认识的一个单身姐姐，三十多岁还经常被认成 95 后，每天穿着球鞋走路蹦蹦跳跳的，感觉特别可爱”。

此外，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还通过展示女性生育后迅速丧失性吸引力来论证不生育的好处。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质疑成为母亲的女性是如何忍受身材走形的，“本来都或者身材窈窕纤细，或者是气质型淑女，一生完孩子，眼看着就像发面馒头一样，肿成大妈。我一个朋友一柜子原先的衣服都穿不了了，都得重新买”。评论中分享了更多她们知道的女性生育后丧失性吸引力的例子，“我的扬琴老师，结婚前她整个人都白到发光，很有活力的那种。结婚后没多久就怀孕了，整个人都变得很黯淡，穿着特别宽大的裙子，只剩一个被榨干的空壳”，“女人生孩子以后真的变成黄脸婆，各种妊娠纹、剖腹产伤疤，身材走形的很严重”。

尽管少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女性，但这些讨论中，对少女相貌的追求却能够赋予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以力量。她们将成为母亲视为对女性气质的威胁，有孩子的女性往往缺乏性吸引力，变得衰老。与此对应，未婚的年轻少女则充满活跃的性魅力，是一种理想的女性气质的化身。然而，她们对少女感的追求依然将女性放在了被凝视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成为了更隐蔽的异性恋欲望的对象。这与 Gill 的研究（2003）相一致，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通过将女性的身体再度性化（Resexualization）维持作为女性的性别认同。

3.2.3 强大的母亲

尽管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组员倡导自愿无子女的理念，但她们并没有完全拒绝接纳母性作为女性的性别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 Bock 和 James 所指出的（2005），女性身体的生育能力是被认为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一项重要差异。虽然这一差异长期以来被置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并造成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然而，Rich（1995）在区分为制度的母性和作为体验的母性时就暗示了母性有可能成为女性创造力和快乐的潜力场所。她指出，如果允许女性自己定义母性，它有可能赋予女性权利。本研究发现，恐婚恐育小组的组员能够重新将母性纳入女性的性别认同之中。

例如，在一篇讨论生育为何伟大的帖子中，不少组员肯定了生育的价值，“人本身就是能从给予中汲取快乐的，女性通过生育和抚养孩子，天然地就有获取这种高级快乐的能力”，“生物的本质是生存与繁衍，故而生育伟大。只有女性才拥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而生育也本应该是女性的权利与权力”，“我们作为女人，我们有子宫，难道我们不能自己决定生不生孩子吗？子宫是我们的权利，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原罪”。这些言论呼吁 O'Reilly（2016）所倡导的“母性的自主权(Maternal agency)”，它旨在促进女性权力的生育实践，这体现在母亲们在挑战和反对作为制度的母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上。

进一步地，单身生育作为可能实现母性潜力的备选方案，在恐婚恐育小组中得到了一部分组员的认可。然而，考虑到单身生育并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想要单身生育的女性需要支付医学辅助生产的费用（包括购买精子和培养试管婴儿）。此外，单身生育的女性也无法使用职工生育保险，需要负担产检和生育费用，且无法享受产假期间照常发放薪水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默认了只有拥有卓越经济能力的女性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明确将生育划为部分女性的特权，“牛逼姐姐生女儿明明就是很喜闻乐见的事情啊，反而一般中产以下女性最好别生，生下来也很难完全给女儿提供好的教育，也不一定能一直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冠名权”，评论中进一步划分了不同财力女性可以实现的目标，“条件好选择单身生育，挑最好的精子，条件中等可领养女婴，条件差就单身咯”，还有人认为，“其实我发现单身生育和合作生育，女人承担的责任没有两样，男人都是来蹭成果的，最多稍微支付一点金钱，但是还有更多不付钱的……如果有物质条件富足的独生女，也同时有生育意愿的话，完全可以挑选优质基因单身生育”。

除此之外，恐婚恐育小组的部分组员也认为，选择单身生育的女性是清楚地明白生育的高额成本，却愿意为此负责。尽管她们自己也许不会这么做，但敢于单身生育的女性是值得敬佩的。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微博上一位单身生育博主的经历，她称赞这位母亲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繁殖欲是正常的需求。是自身综合条件能力足够了想生孩子。木大妈经济稳定（博主），微博也说了生了孩子父母退休帮带，所以才考虑生孩子”，“人家有钱有房，身体健康，生了孩子跟自己姓，而且有条件有决心给孩子最好的资源培养孩子……而大多数女人，没有继承权，两手空空踏入婚姻……又兼顾家庭伺候老公照顾老人，这两种情况能放在一起讨论吗？”。这些言论将母性重新纳入女性的性别认同之中，然而，与霸权的女性气质强调女性是天然的母亲不同，对支持单身生育的组员来说，成为母亲不再居于女性的性别认同的核心地位，而是作为一种边缘的、可选择的身份，作为女性

强大实力的象征。单身生育的女性既有无私奉献的母性，又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她们的身上混合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特征，表现出一种替代性的女性气质。

然而，部分组员提出的单身生育建议显然存在问题，它并没有鼓励社会各机构及组织分担女性的生育压力，而是将养家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叠加在女性身上。这意味着女性不仅要做母亲，还要努力地成为父亲，她们的设想并没有跳出父权制下的母性规范，反而加深了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单身生育的建议在小组中也遭到反对，“为什么非要给自己的人生开困难模式？”，“生育伤害完身体以后还会在小孩成长过程中不断伤害你的精神，何苦自己找罪受？”，“现在要养育一个孩子可不是像以前能活着就行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都会想给孩子，还会觉得孩子值得更好的，这是个无底洞”。可以看出，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并没有为母性找到理想的赋权形式，“强大的母亲”作为女性可能采取的一种性别认同方式依然受到质疑。

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可以通过扩展女性气质的边界实现性别认同。恐婚恐育小组的组员将霸权的男性气质中包含的“独立”、“控制”、“自我实现”等特质纳入到女性的性别认同中；也通过追求象征着年轻美丽的“少女感”维持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化身份；最后，母性有可能回归到女性的性别认同之中，但它作为边缘化的、可选择特质，目的是为了体现女性可以成为双性化的存在。这反映了女性气质向男性领域扩展的潜力，然而其自身也存在不断增长的自我矛盾的谈判。

4 对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的批判

在这一章中，我的分析不是对参与者的经验进行总结。本研究将转向宏观层面的批判分析，将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所采用的日常话语与社会中更大的意识形态（例如，母性的规范、霸权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

我认为，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虽然有意识地抗母性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但这些女性对成为母亲的想象依然是理想化的“好妈妈”，她们并没有跳出母性的规范话语；其次，尽管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能够建立替代性的女性气质，但她们并没有挑战霸权的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支配地位，而是尝试将男性气质的特征融入女性气质之中，以此建立相较于霸权的女性气质的优越感，这种女性气质内部的竞争加深了女性主义的“母亲恐惧症”，造成女性内部的分裂；第三，尽管部分组员支持有经济条件的女性选择“单身生育”以对抗父权制度对母性的压迫，恢复母性的潜力，然而这种后女性主义的“选择”话语存在显著问题，它掩盖了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将生育变为少数精英女性的特权；同时，它掩盖了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默认了抚育孩子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父权制中的母性理想依旧限制着女性的生育想象；最后，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保持“少女感”的渴望暗示了女性的身体属性依旧居于性别认同的核心，而后女性主义通过将年轻美丽包装为女性自我赋权的表达，再度将女性身体变成了被凝视的对象。

4.1 规范的母性话语：强化的呵护

Maier 和 Saugeres 的研究（2007）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更容易把规范的母性话语所塑造的“好妈妈”的刻板印象当作是理想化的母亲，这种母亲通常表现出对孩子强烈的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而已经生育孩子的女性尽管也受到规范的母性话语的束缚，但她们更注重用实际的策略来履行母亲的职责并兼顾其他生活目标。

本研究支持上述对自愿无子女的女性的发现，事实上，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对病态的母亲的想象大部分来源于规范的母性话语中“强化的呵护（intensive mothering）”的育儿形式。这一理念认为，只有母亲才是孩子适当的照顾者，而母亲需要进行以孩子为中心的、受专家指导的、投入大量情感、时间和金钱的照料形式（Hays, 1996）。Wang 和 Mihelj（2019）展示了中国媒体塑造的“超人母亲”（super mom）形象，她肩负着职场生涯和育儿责任的双重负担，并在教育竞争白热化的中国社会为孩子的教育

付出长期密集的投入(Kuan, 2015)。受上述母性话语的影响,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认为成为母亲对女性来说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

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道,“看育儿经经常会发现妈妈们描述生娃后的幸福时候,是娃睡了,自己一个人终于能玩半小时手机。婆婆帮忙带半天娃,于是这一年来终于可以自己出门吃一碗麻辣烫……其实这些我们看来很平常的幸福,是当妈后就再也回不去的快乐了”。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认为生育必然会扰乱女性的人生计划,“有些女生一生孩子,不知道怎的,就像加入了一个神奇的教派,突然就变得无趣了,生活也失去了自我”,“所以怎么说不能生孩子呢?很多女人生孩子之后,感觉就放弃了自己。平时有点钱就给孩子,有点精力就照顾孩子”,“一些女性生完后‘妈味’真的很重。每天‘孩’本位思考问题,为了孩子把自己生生毁了的感觉”。这些讨论展示了强化的呵护的育儿标准是如此之高,要求女性在生育后迅速发展出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母性话语的影响下,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以病态的方式理解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计划被孩子改变,只能以自愿无子女的形式逃避母性的规范。

4.2 母亲恐惧症的后果

Finley (2010) 指出,尽管替代性的女性气质可以对霸权的性别秩序造成破坏,但它可能依然以男性气质巩固性别间的关系。本研究支持这一发现,事实上,霸权的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支配地位在自愿无子女女性的性别认同中依旧发挥着作用。具体来说,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尝试将一些男性气质的特征,包括“自主”、“独立”、“控制”融入女性气质之中,建立相较于霸权的女性气质的优越地位。然而,父权制体系下各类女性气质之间的谈判并不鼓励女性责备父权制体系,相反,它鼓励女性责备女性。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通常也是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的患者,她们害怕成为母亲。母亲不仅是孩子的奴隶,也是丈夫的仆人,她因生育变得如此脆弱,被动,依赖于他人。结果,正如 Rich 所指出的(1995),直接地厌恶并拒绝一个母亲,远比透过她看到施加在她身上的力量要容易得多。

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通常以嘲弄其他母亲的形式抵抗作为制度的母性。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有网友在一位母亲描述生育损伤的微博下问,“孩子跟谁姓?”,这位母亲回复“你有病吧”。楼主嘲笑了这位“气急败坏”的母亲,“仅仅是点出她们失权的事情就嗷嗷叫了。不过她们也就这点本事了,在孩子爹面前大气不敢出的,被啃烂了奶头泪往心里流”。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嘲笑作为妻子的母亲在丈夫面前的顺从地位,“她们诉苦不是为了离开,而是希望要价,看我这么辛苦。要

女权骂老公也不是真骂，而是希望女权帮她调教老公，继续两个人甜甜的爱情”，“不怪给她们带来这一切苦难的男人，反而骂那些让她争取权利的人，不愧是驴”，“不过是无能懦弱的表现罢了，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敢反抗”。这些讨论反映了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是多么厌恶成为母亲的女性。母亲恐惧症的一种严重后果是，它鼓励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责备已生育的女性，而不是责备父权制。做一个母亲是如此的软弱，而女性渴望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束缚，变得个性化和自由。最终，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在女性气质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观点，是做软弱的母亲？还是叛逆的女人？这造成了女性之间彼此的分离。

4.3 “超级妈妈”的“选择”

McRobbie (2009) 分析了后女性主义作为当代女性主义的分支的发展历程。在后女性主义的文化中，年轻的女性被给予了特殊的自由、权力和选择，作为女性主义政治和变革的一种替代。女性主义既被部分地肯定，也被部分地否定。本研究发现，恐婚恐育小组的部分组员对单身生育的想象是后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

尽管小组成员支持单身生育的初衷是“生育权掌握在女性手中”，“把女人的疆土留给女人，养育出进一步开辟新世界的女继承人”。然而，这一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后女权主义的扭曲。虽然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提到了一些与单身生育配套的母系的儿童抚育形式，如，由女性社区共同抚养孩子。然而，在现有的不完善的生育制度下，能够单身生育的只有极少数精英女性，她们买精生子，独自抚养孩子，这样的单身生育在小组中被贴上了“女王行为”的标签。我认为，在父权制的生育环境中，关于单身生育的美好畅想只是延续了规范的母性话语中对“超级母亲(super mom)”的想象。超级母亲不仅可以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能通过兼顾工作展现个人价值，她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效能感来承担和坚持高强度育儿的巨大挑战(Hays, 1996; Choi et al., 2007)。

此外，尽管真正有能力单身生育的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女性，但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却将这一有条件的生育行为包装成了女性的“选择”。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询问组员们是否会选择单身生育，希望有孩子的女性都为自己假设了一个前提，“如果我特别有钱，还有美队那种极品哥哥睡，就生”，“如果在一个福利好的国家而且有能力给孩子好的生活，我会的”，“如果我很有很有钱（后半辈子不用工作还能养老那种），可能会考虑生”……这些讨论恰恰证明了单身生育并不是所有女性的选择。后女性主义的“选择”修辞将女性的注意力从压迫性的社会制度转移到她们个人身上，这掩盖了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将生育变为少数精英女性的特权；更

重要的是，它掩盖了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默认了抚养孩子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避免了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更难以处理和实现的系统性变革。

4.4 为“美丽”赋权

Gill 和 Scharff 指出 (2013)，在后女性主义的时代，女性气质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身体属性，一些女性化的表现方式正在成为女性主体性的象征。本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对“少女感”的追求也反映了上述趋势。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认为不生孩子可以长久地保持年轻美丽，因此，她们是比丧失了性吸引力的母亲更加优越的女性。然而，在女性为美丽赋权的同时，她们的讨论恰恰显示了霸权的女性气质的自律期望如何限制了女性对身体属性的理解。

事实上，把美丽简单地界定为“少女感”为女性创造了不现实的身体理想，它依旧属于男性审美下的“瘦白幼”的风格，要求女性时刻做好服务于男性的性准备。例如，在一个帖中，楼主分享了已经生育的女明星李小璐的抖音 app 视频截图，她认为李小璐“正面腰还是有的 但是侧面肉就很厚，大腿根和手臂的拜拜肉怎么减都减不掉”，“而很多没生产过的女生的腰，侧面真的很薄，很好看”。现实中的女性有各种各样的身材与风格，然而，上述讨论依旧将纤瘦的身材作为女性美的理想，这一理想甚至连女明星也无法达到。尽管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希望将母性从女性的性别认同中分离出来，但讽刺的是，她们通过重申霸权的女性气质的规范实现这一目标，这显示了保持“年轻美丽”对女性的限制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此外，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还指出，女性生育后丧失性吸引力会导致丈夫去寻找婚姻外的性伴侣。例如，在一个帖子中，楼主分享了自己恐育的原因之一，“牺牲了身材，牺牲了奶子和阴道，留下各种疤痕，最后亲亲老公看着硬不起来，失去兴趣了，之后再埋头自责自己没有吸引老公的魅力了 无奈只能任由老公嫖娼，约炮，出轨”。评论中支持楼主的观点，认为与其这样，不如不生孩子。“生孩子有什么意思，有多少老公在生产后嫌老婆排恶露脏分房睡的”，“顺产的阴道口被撑的像西瓜一样大，怎么做盆底肌修复也不可能跟原来一样，至于剖腹产，小心伤口液化难恢复，到时候亲亲老公还有性欲吗，肯定要离婚的。”

霸权的女性气质的核心话语是女性相互竞争以获得男性的爱，而女性通过自己的身体参与这种竞争，她们的身体必须保持紧实、干净、年轻 (Boulton and Malacrida, 2012)。尽管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并不看重吸引男性，但这样的讨论依旧暗示着女性希望成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她们强调了性吸引力作为女性气质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将霸权的女性气质的规范转化为自身主体性的象征，这支持了后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

的再度性化（Resexualization）。

4.5 回应批判：为母性赋权

在《女人所生》一书中，Rich 表示（1995），女性不应该接受以“母性（motherhood）”命名那些从母亲的身上偷走和剥夺的力量。作为开发母性潜力的一种方式，“为母性赋权（empower mothering）”意味着发展新的母性观念，以减轻父权制社会中母性的规范与话语母亲的压迫（O'Reilly, 2016）。O'Reilly 总结了赋权的母性可能具有几个主题：母亲满足自己需求的重要性；做一个母亲不能满足女人的所有需要；让他人参与孩子的培养；积极质疑社会对母亲的期望；挑战主流育儿做法；不相信抚育孩子是母亲的唯一责任；挑战母亲对孩子唯一的情感是爱的观点。我认为，Ruddick 的母性的思维（maternal thinking）概念和 Chodorow 鼓励母亲走出家庭的倡导可以作为对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规范的回应，帮助女性以一种更加舒适、自信、能够胜任的方式想象如何成为一个母亲。这有可能减少女性的“母亲恐惧症”，同时破除压在女性头上的“超级母亲”的紧箍咒。

4.5.1 从职责（motherhood）到实践（mothering）

Ruddick 认为，母亲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智力活动，而母性的思维指的是母亲发展出的智力能力，她做出的判断，抚育孩子的态度，以及她通过母性实践所肯定的价值观（1989）。Ruddick 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才具有母性思维，任何一个献身于母性实践的人都有可能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因此，Ruddick 解释说，当她使用“母亲”这个词时，她指的是那些对孩子的生活承担责任的人，照顾孩子是他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uddick 坚持认为（1989），男性能够并且经常从事母亲的工作，抚育孩子并不是女性天然具有的能力和职责。

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规范默认了作为个体的母亲承担绝大部分的育儿劳动，作为结果，生育对女性来说要么意味着逼迫自己成为育儿和工作兼顾的“超级母亲”，要么意味着退出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使女性承受着“强化的呵护”的育儿压力，如果她们不能给孩子足够的爱的投入，女性往往内疚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母性的思维鼓励将母亲的职责分散给更多的个体和机构，他们可以是父亲、爷爷、奶奶等家庭成员，也可以保姆、托儿所、育儿中心等社会组织和职员。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育儿压力由全社会共同分担时，女性才更容易感到自己可以胜任母亲的身份，她们可能更愿意拥有孩子，而社会也能共享抚育儿童所创造的各种社会价值。

4.5.2 走出家庭的母亲

在《母性的再生产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书中，Chodorow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了女性如何从她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了对父权制下的母性的理解，并将其带入自己如何成为一个母亲的想象。Chodorow 认为 (1999)，母亲给予女儿的，不仅仅是一个脆弱的自我边界，更是父权制社会中作为母亲的软弱和无力。当女儿认同了自己的母亲是软弱而无力的，她会在在权利方面产生一种作为女性的自我缺失感，这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也是“母亲恐惧症”的根源。相反，如果女儿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强大的女人，母亲对她生活的重要领域有着明确的控制，母女关系会赋予女儿力量。女儿通过与母亲的联系接受自己的性别认同，她从母亲身上获得作为女性的自信和力量。而这样的女儿也更愿意以同样赋权的方式成为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

Chodorow 认为，当母亲的身份不再是女性唯一或决定性的角色时，女儿才能够真正发现母亲的身份是有意义的 (1999)。家庭主妇式的母亲已无法激起女儿对母亲的认同，惟有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母亲实现自己的价值，如：参与工作，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贡献者；或者，与其他女性，而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呆在一起，在女性社区中享有地位。这时，女儿才能从母女关系中感受到一种力量感，她也更愿意成为一个母亲。而要广泛地建立这种健康的母女关系，需要社会共享“母性的思维”，为女性分担育儿压力，鼓励母亲走出家庭，让她们在多个领域施展自身才能。

5 讨论与总结

尽管成为母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女性成熟身份的基础，然而，随着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数量逐渐增多，有必要将自愿无子女的选择纳入到女性性别认同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之中。本研究通过对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 235 个帖子进行批判性主题分析发现：一方面，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能够将母性病态化，拒绝将其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同时她们通过挑战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合理化不生育的决定；另一方面，融合了霸权的男性气质，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的替代性的女性气质为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建构性别认同提供了新路径。然而，小组成员对成为母亲的想象依并没有跳出父权制下母性的规范话语；女性气质内部的竞争也鼓励无子女的女性责备成为母亲的女性；后女性主义的“选择”修辞掩盖了“单身生育”的理想背后不同阶层女性的经济差异和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对“少女感”的追求将霸权的女性气质的规范转化为女性主体性的象征，支持了后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再度性化。

5.1 研究贡献

5.1.1 理论贡献

本研究补充了关于自愿无子女的跨文化研究。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主要聚焦于女性选择自愿无子女的理由以及她们是如何应对污名的（Abma and Martinez, 2006; Tanturri and Mencarini, 2008; Shapiro, 2014; Morison et al, 2016）。这些研究反映了社会中强大的繁殖主义传统依旧会给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带来压力。然而，本研究发现，中国的自愿无子女女性可以以更激进的方式将母性病态化，她们认为母亲是软弱，被动，非理性，为孩子而活的女人。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规范的母性话语如何影响了女性对成为母亲的想象。强化的呵护的育儿理念在当代中国是广泛流行的，“好妈妈”被定义为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投入大量感情和精力培养一个优质的孩子的人（Greenhalgh and Winckler, 2005）。理想的育儿标准是如此之高，要求女性在生育后迅速发展出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导致了女性以病态的方式理解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她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被孩子改变，只能以自愿无子女的形式逃避母性的规范话语。

其次，之前西方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可以明确地区分作为制

度的母性和作为体验的母性，她们将这两者混在一起，笼统地认为生育会让女性变得不自由（Gillespie, 2003; Hayden and O'Brien, 2010; Peterson, 2015）。然而，本研究发现，中国自愿无子女的女性明确地区分这两者，她们甚至提出了“单身生育”理想反对父权制对母性的压迫，并恢复母性的力量。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父权制基础更为强大，母亲对儿子的偏好以及丧偶式的育儿分工令女性更显著地感受到父权制对母性的压迫（郭戈，2019）。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观念依旧鼓励女性享受为人母的乐趣（Adams, 2016），这使得女性在矛盾中提出了单身生育的构想。然而，缺乏充分的福利保障的单身生育依旧延续了父权制社会对“超级母亲(super mom)”的想象。后女性主义的“选择”修辞掩盖了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的经济差异和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避免了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更难以处理和实现的系统性变革。

本研究还发展了有关性别操纵和替代性的女性气质的理论。之前的研究发现，表现出替代性的女性气质的女性可以通过嘲笑表现出霸权的女性气质的女性实施性别操纵（Schipper, 2002; Lundstrom 2006）。本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同时发现，这种性别操纵策略可能存在对女性不利的结果。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对已生育的女性的贬低令她们患上了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与 O'Brien 的研究相一致，女性气质内部的竞争鼓励女性责备女性，而不是责备父权制（2007）。这造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使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与已生育的女性割席，而不是反对父权制对母性的压迫。

此外，之前的研究发现，女性能够将被遗弃的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负面标签重新解释为积极的实施性别操纵（Finley, 2010）。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她们将“自私”的指责重新解释为“爱己”，蔑视了霸权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规训。事实上，这种叛逆的女性气质表现出了霸权的男性气质的特征，强调“控制”，“自主”与“自我实现”（Terry and Braun, 2012）。这证明了女性越来越有可能使用男性气质的话语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重要策略。然而，正如 Jaji 所指出的（2015），替代性的女性气质中依然有可能混合了霸权的女性气质的性别规范。本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发现替代性的女性气质可能表现出后女性主义的趋势。自愿无子女的女性依然看重性吸引力作为女性气质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将霸权的女性气质的规范转化为自身主体性的象征。

5.1.2 实践贡献

本研究的实践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研究发现，规范的母性话语创造的“好妈妈”和“超级妈妈”的神话限制了女性对成为母亲的想象，让没有孩子的女性认为做母亲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为此她们必须放弃自我。作为对过高的育儿理想的激进回应，一部分女性选择不生育孩子以逃避母性的束缚。是时候将育儿的责任分散给更

多的个体和组织以减轻母亲的压力。例如，通过制定夫妻合休产假的相关规定鼓励男性承担必要的育儿责任；采取多种政策鼓励育儿托管机构的发展，完善托管机构的育儿服务，加强育儿监督，制定合理的收费价格，增加各级学校的住宿生名额，为双职工父母减轻育儿压力；开放单身生育，允许女性通过医学辅助手段拥有孩子，为单身母亲提供与已婚母亲同样的生育保险，产假补偿等生育福利；为生育家庭发放补助，提供生育补贴，减免儿童上学费用。

第二，正如《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一书中指出的，社会中日渐增长的个体化趋势正在让女性的正常生活故事更接近于男性（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女性越来越有可能将男性气质的“自主”，“控制”，“自我实现”等特质纳入到女性的性别认同之中。然而，父权制的母性话语依旧将“母亲”的角色限制在私人领域的家庭内部。随着女性越来越抗拒“家庭主妇”的角色，母亲必须走出家庭。当“母亲”不再是女性唯一或决定性的角色时，女性才能从这一身份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她也更愿意成为一个母亲。因此，政府及各社会组织应鼓励女性在多领域实现价值。例如，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禁止企业在招聘中歧视已婚未育及已育的女性，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进一步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同时，做母亲的女性也需要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不必将照顾孩子当作个人生涯的核心事务。当母亲越来越愿意努力发展自身的爱好和成就，孩子也越来越尊重并敬佩母亲。

第三，在个体化时代，自愿无子女的女性越来越有能力抵抗不生育的污名，社会应逐渐接受不生孩子是女性可以拥有的一种选择。然而，我国的社会养老机构发展并不完善，“养儿防老”依旧是人们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之一。随着自愿无子女的人数逐渐增多，政府应大力发展养老机构和组织，为养老院提供补贴，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鼓励多种互助型养老社区的建设，允许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家庭主导型等养老方式共同发展，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5.2 研究不足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只关注了单身的、异性恋的、自愿无子女女性如何建立性别认同，已婚女性、女同性恋、以及其他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中选择不生孩子的女性是如何在母性之外解决她们的性别认同的尚不得而知，未来可以对这些女性群体进行研究；此外，之前的研究发现自愿无子女的选择也会影响男性的性别认同，因为自愿无子女的男性缺少“承担责任”、“供养家庭”的霸权的男性气质（Terry and Braun, 2012），未来可以对自愿无子女的男性的性别认同进行研究。

其次，本研究只选取了女性在豆瓣恐育恐育小组中发布的讨论进行研究，然而，

这些网络讨论具有碎片化、非理性的特征。网络评论也受到舆论领域“沉默的螺旋”效果的影响，一些持有非主流观点的组员可能会避免发言。因此，只关注网络社区中的讨论不能全面地反映自愿无子女的女性的观点。未来应与恐婚恐育小组中的一些组员取得联系，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组员的真实想法，这可能会带来全新的发现。

最后，本研究将“自愿无子女”定义为自愿选择不生孩子。然而，正如 Moore 指出的（2014），自愿无子女有多元化的解释，那些领养孩子、成为继母、一直推迟生育时间的女性也有可能认为自己是自愿无子女者。未来可以对这些女性群体进行研究，以丰富学界对“自愿无子女”的理解。

5.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豆瓣恐婚恐育小组的235个帖子进行批判性主题分析研究了女性如何将自愿无子女的选择纳入到性别认同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之中。一方面，女性能够将母性与负面的女性气质联系袭来，并挑战父权制下作为制度的母性，拒绝将其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核心；另一方面，女性能够融合霸权的男性气质，强调性吸引力的异性恋特质，以及展现爱和关怀的母性发展替代性的女性气质。本研究将性别操纵理论应用了中国的性别环境中，并丰富了对自愿无子女的研究。恐婚恐育小组的成员并没有跳出父权制下母性的规范话语，而是将其病态化并逃避；通过嘲笑已育女性实施的性别操纵鼓励女性责备女性，加剧了女性主义的母亲恐惧症；后女性主义的“选择”修辞掩盖了“单身生育”的理想背后不同阶层女性的经济差异和育儿中的性别不平等；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对“少女感”的追求支持了后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再度性化。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其他自愿无子女的女性和男性是如何发展性别认同的。

参考文献

- [1] 张竞月.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分析[J].大众标准化,2020(21):154-156.
- [2] 高荣. 生育想象: 新浪微博“恐育”情绪话语研究[A].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论坛·健康传播分论坛 | 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 2020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9.
- [3] 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02):61-67.
- [4] 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J].北京社会科学,2019(10):117-128.
- [5] (英)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1949 年以来的性别话语[M].施施,译.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6] Lynch, I., Morison, T., Macleod, C. I., Mijas, M., du Toit, R., Seemanthini, S. From deviant choice to feminist issue: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scholarship on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1920–2013) [J].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2018:11-47.
- [7] Gillespie, R. When no means no: Disbelief, disregard and deviance as discourses of voluntary childlessness[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0(23):223-234.
- [8] Hintz, E. A., Brown, C. L. Childfree and “bingoed”: A relational dialectics theory analysis of meaning creation in online narratives about voluntary childlessnes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20(87):244-266.
- [9] Weigle, M. Spiders and spinsters: Women and mythology[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2.
- [10] Gill, R., & Scharff, C.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M]. London: Springer, 2013.
- [11] Maher, J., Saugeres, L. To be or not to be a mother? Women negotiat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ing[J]. Journal of Sociology,2007(43):5-21.
- [12] Moore, J. Reconsidering childfreedom: A feminist exploration of discurs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hildfree LiveJournal communities[J].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2014(37):159-180.
- [13] Peterson, H., Engwall, K. Silent bodies: Childfree women's gendered and embodied experiences[J].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13(20):376-389.
- [14] O'Reilly, A. Matricentric feminism: Theory, Activism, and Practice [M]. Bradford: Demeter Press, 2016.
- [15] Rich, A.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 London: WWW Norton & Company, 1995.

- [16] Jaji, R. Normative, agitated, and rebellious femininities among East and Central African refugee women[J]. *Gender, Place & Culture*,2015(22):494-509.
- [17] Connell, R. W. *Gender and powe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8] Tracy, S. J.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llecting evidence, crafting analysis, communicating impact*[M].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 [19] Tripathy, J. P.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Ethical Issues and Challenges[J]. *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3(42):1478-1479.
- [20] Lawless, B., Chen, Y. Developing a method of critical thematic analysis for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inquiry[J].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2018(30):92-106.
- [21] Braun, V., Clarke, V.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2006(3):77-101.
- [22] Bacchi, C. Discourse, discourse everywhere: Subject “agency” in feminist discourse methodology[J].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2005(13):198-209.
- [23] Abma, J. C., Martinez, G. M. Childlessness among older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rends and profil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6(68):1045-1056.
- [24] Dykstra, P. A., Hagestad, G. O. Roads less taken. Developing a nuanced view of older adults without children [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7(28):1275-1310.
- [25] Tanturri, M. L., Mencarini, L. Childless or CHILDFREE? Paths to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 Ital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8(34):51-77.
- [26] Moore, J. The fixed childfree subjectivity: Performing meta-facework about sterilization on reddit[J]. *Health Communication*,2020:1-10.
- [27] Beck, U., Beck-Gernsheim, E. *Individualiza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28] Morison, T., Macleod, C. *Men’s pathways to parenthood: Silences and gendered norms*[M]. Cape Town: HSRC Press, 2015.
- [29] Park, K. Choosing childlessness: Weber’s typology of action and motives of the voluntarily childless[J]. *Sociological Inquiry*,2005(75):372–402.
- [30] Shapiro, G.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Studies in the Maternal*,2014(6):1–15.
- [31] Taylor, E. N. Throwing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Childfree advocates and the rhetoric of choice[J]. *Women & Politics*,2003(24):49–75.
- [32] Morison, T., Macleod, C., Lynch, I., Mijas, M., Shivakumar, S. T. Stigma resistance in online childfree communities: The limitations of choice rhetoric[J].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016(40):184-198.

- [33] Chen, C. J. Mothering under the shadow of patriarchy: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motherhood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aiwan[D]. Taiwan University, 2006.
- [34] Terry, G., Braun, V. Sticking my finger up at evolution: Unconventionality, selfishness, and choice in the talk of men who have had “preemptive” vasectomies[J]. *Men and Masculinities*, 2012(15):207-229.
- [35] Hayden, S. E., O'Brien, H. D. Contemplating maternity in an era of choice explorations into discourses of reproduction[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 [36] Peterson, H. Fifty shades of freedom.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as women's ultimate liberation[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15(53):182-191.
- [37] Evans, H. The subject of gender: daughters and mothers in urban China[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 [38] Adams, J. Why do women want children? The case of Hong Kong, China: A lowest-low fertility context[J].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16(52):632-653.
- [39] Greenhalgh, S., Winckler, E. A.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0] Letherby, G. Other than mother and mothers as others: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and non-motherhood in relation to ‘infertility’ and ‘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99(22):359–372.
- [41] Gillespie, R. Childfree and feminine: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identity of voluntarily childless women[J]. *Gender and Society*, 2003(17):122–136.
- [42] Rich, S., Taket, A., Graham, M., Shelley, J. ‘Unnatural’, ‘unwomanly’, ‘uncreditable’ and ‘undervalued’: 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 a childless woman in Australian society[J]. *Gender Issues*, 2011(28):226–247.
- [43] Malacrida, C., Boulton, T. Women’s perceptions of childbirth “choices”[J]. *Gender & Society*, 2012(26):748-772.
- [44] Schippers, M.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other: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 gender hegemony[J]. *Theory and society*, 2007(36):85-102.
- [45] Carlson, J. Subjects of stalled 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nity[J]. *Feminist Theory*, 2011(12):75-91.
- [46] Schippers, M. ‘Rockin’ out of the box: Gender maneuvering in alternative hard rock[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7] Finley, N. J. Skating femininity: Gender maneuvering in women’s roller derb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0(39):359-387.

- [48] Lundstrom, C. "Okay, but we are not whores you know": Latina girls navigating the boundaries of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Sweden[J]. *Nordic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2006(14):203-18.
- [49] Choi, P., Henshaw, C., Baker, S., Tree, J. Supermum, superwife, supereverything: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the transition to motherhood[J].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 2005(23):167-180.
- [50] Nelson, M., K. Parenting out of control: Anxious parents in uncertain time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 [51] Malson, H., Swann, C. Re-producing 'woman's' body: Reflections on the (dis)place(ments) of 'reproduction' for (post)modern women[J].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2003(12):191-201.
- [52] Crawley, S. L., Foley, L. J., Shehan, C. L. Gendering Bodies[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 [53] Chodorow, N. 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J].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1995:61-80.
- [54] Johnson, M. M. Strong mothers, weak wives: The search for gender equality[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55] Correll, S. J., Benard, S., Paik, I.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7(112):1297-1338.
- [56] Benard, S., Correll, S. J. Normativ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otherhood penalty[J]. *Gender & Society*,2010(24):616-646.
- [57] Carlson, J. Subjects of stalled 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nity[J]. *Feminist Theory*,2011(12):75-91.
- [58] Gill, R. 'From Sexual Objectification to Sexual Subjectification: The Resexual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the Media'[J]. *Feminist Media Studies*,2003(3):100-105.
- [59] Bock, G., James, S. Beyon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itizenship,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M]. Routledge, 2005.
- [60] Hays, Sharo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1] Wang, Y., Mihelj, S. A socialist superwoman for the new era[J]. *Feminist Media Histories*, 2019(5):36-59.
- [62] Kuan, T. 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63] McRobbie, A.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M]. London: Sage Press, 2009.

- [64]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65] Chodorow, N. J.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66] O'Brien, D. L. Matrophobic sisters and daughters: The rhetorical consequences of matrophobia in contemporary white feminist analyses of maternity[J]. *Women's Studies*, 2007(36):269-296.